

014037677

F131
09

转型经济研究丛书

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果

东亚转型研究

刘洪钟 崔岩 佟苍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726062

F131
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转型研究/刘洪钟, 崔岩, 佟苍松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8

(转型经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41 - 2177 - 3

I. ①东… II. ①刘…②崔…③佟… III. ①经济
发展 - 研究 - 东亚 IV. ①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925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张庆杰 向焕强

责任校对: 郑淑艳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邱 天

东亚转型研究

刘洪钟 崔 岩 佟苍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6 印张 270000 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177 - 3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作为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重要建设成果，经过学术团队三年多的辛勤创作与撰著，《转型经济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

“转型经济”这一概念的使用，源于转型经济国家群体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尤其是苏联解体，这些国家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熟悉的计划经济，开始朝向陌生的市场经济转变。于是，转型经济体便油然而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点，即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及以此精神为指导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也成为转型经济体的一员。因为，此时的中国在十几年“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探索的基础上，决定与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地分道扬镳，进而正式地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经济出现20多年后，显然与其脱胎而来的计划经济业已面目全非。与此同时，它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有相当明显甚至具有本质属性的差异。还可以初步预料的是，今后转型经济背弃传统上的计划经济的距离将进一步拉大，但却得不出它将被彻底并入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类别的结论。看来，转型经济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

我和我的团队骨干商议并决定撰著这套丛书的时候是2009年的夏天，回忆起来，具体是2009年的8月17~20日。四天里，我们同吃同住，封闭式工作，夜以继日地研讨丛书的立意、创新、重点、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那是源于美国、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高点持续的时刻，这也是我有必要提及的撰著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俄罗斯等转型经济国家的表现不同，但共同点在于均

遭遇来自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而遭遇冲击的缘由在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如中国是过度的外贸依赖（当然还有投资依赖），俄罗斯是过度的能源依赖。由此引起思索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说以往转型经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话，那么当下，转型经济国家在必须继续深化和完善这一事业的同时，又迫在眉睫地面临着根本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这进一步表明，转型经济的使命真的可谓任重道远。

转型经济研究这一议题强烈地吸引了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写作体例方式。我的意见顺畅地成为团队骨干的共识，即撰写一套由六本著作构成的丛书。既然是一个命题之下的丛书，基本要求自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罗列，而是要有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的第一部著作《转型政治经济学导论》，集中讨论转型经济的约束条件、转型目标与政策空间、转型的现实矛盾与演化机制、转型经济的未来发展等一系列关乎转型经济的基本问题，旨在为随后展开进行的国别研究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国别研究是丛书的主体部分，包括《东亚转型研究》、《俄罗斯转型研究》、《中东欧转型研究》、《中亚转型研究》四部著作，分别对这些研究对象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程与特色、成效与问题以及未来走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尽力深入的分析。此处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严格地讲，东亚并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转型经济体之列，然而，发端于日本而形成的极具特色的东亚模式及其后来的转型理论与实践，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纯粹的转型国家，事实上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催化和借鉴作用。所以，把东亚转型置于国别研究部分之首，有助于我们从历史脉络的角度加深对转型经济的理解。最后的落脚点定位在中国，以《中国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特色之路》收官。我们期待通过这种总、分式的系统安排体例，既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与方法方面，又在梳理和剖析纷繁复杂的实践经验方面，对于转型经济研究的深入做出新的尝试和贡献。

除了丛书方式选择以及体例安排上的新意，我们还始终追求在转型经济研究内容、视角和方法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我只简要指出以下三点，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

第一，把“三化”作为转型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梳理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往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大多只聚焦在经济体制转轨方面。我们认为，经济体制转轨，或者说，经济域的市场化问题，事实上只是转型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化，经济体制转轨基本

取向的市场化,以及政治制度演进的民主化,在我们看来,这“三化”共同构成了转型经济的完整体系。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基本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则需要依托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同时,在实现现代化赶超发展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发挥适应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的动员优势和稳定机制,显然又是十分重要的。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时期,“三化”的侧重点,尤其是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组合方式会有差异和变动,但又存在必须遵循的客观演化规律。把“三化”,尤其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研究有机地统一和衔接起来,贯穿于我们这项研究工作的整个过程。

第二,特别关注转型经济的内外部约束。以往研究转型经济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多为描述转型经济所发生的事实,而对其事实发生的制约因素分析较少,或者不够深入。结果,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项研究事前锁定的突破点之一,就是要在这个环节上有所建树。我们关于转型经济内部约束的基本看法是:以制度变迁为其核心内容的经济转型,改变着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产权边界,本质上是一个财富和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这就必然引发转型主导力量关于“转型不被逆转”、“转型社会支持”、“转型时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问题的优先考虑,从而使得经济转型演变成为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关于外部约束:转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模式选择等,客观上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于是,转型经济外部的各种力量(尤其是主要力量)不会视而不见,必然作出利己主义的支持或者阻挠的行为选项。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转型经济本身的成就抑或问题,又对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秩序、规则等产生重大影响。可见,转型经济的外部约束同样构成了转型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工具。既然转型经济不仅限于经济制度的变迁,还涉及国内公共选择政治域、开放经济域等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此项研究工作在采用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工具纳入其中。对这些方法综合并默契地加以运用是复杂的,然而,学习和驾驭新方法的使用过程却是充满乐趣的,最重要的是,其研究成果一定是更为科学的。

转型经济是一个必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如此看来,迄今20余年的转型经历不过只是拉开了序幕。这就决定了,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研

究成果是阶段性的，是初步的，是不完善的。我们等待着读者的意见反馈，尤其是读者中学界同行们的批评建议，认真消化吸收，促进接续的跟踪深化研究不断提升水平。

程 伟

2013 年 4 月

前言

英国著名大文豪狄更斯在其不朽之作《双城记》的开篇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光,这是最坏的时光”。用这句话概括1997年以来的东亚经济再合适不过了。短短十多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从1997年以前“看上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沈联涛,2009),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冲击,之后刚刚步入“复兴”之路(世界银行,2007),随即又陷入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百年一遇萧条之际,东亚却又承担起了“引领”世界走向复苏的重任(IMF,2010)。动荡之中,东亚发展模式悄然发生变化。

与过去学术界主流的研究将“东亚模式”概括为威权政体、出口导向等内容不同,我们将东亚视作一个区域性的发展主体,倾向于认为东亚模式除了包含经济治理、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制度层面的内容,还应包括独具特色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这一结构层面的内容。它们三位一体,共同造就了过去几十年“东亚奇迹”的发生。同时,受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模式的上述三个层面也相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新的认识既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也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

全书共分6章,基本脉络与核心观点概述如下。

第1章,理解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发端于日本模式,其作为一种后发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经验对东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后来东亚模式的“原型”。但日本的经济发展只是为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的

样板，东亚模式的最终形成，要归因于这些后起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具有东亚特色的共性发展特征。基于这种认识，本章首先考察日本模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从该地区不同类型经济体雁阵继起型的经济赶超实践出发，深入探讨了东亚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威权政体、发展型政府以及区域分工网络构成了东亚模式的主要内容。

第2章，东亚转型的提出。全球化、区域化和民主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三股重要力量，对任何采取开放战略的国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是，有些国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些国家则不慎落入发展的陷阱。本章从考察全球化、区域化和民主化的基本特点出发，讨论了它们对东亚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东亚各国正是及时把握住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给本国所带来的机遇，通过实施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赶超战略，实现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阶段的快速提升。然而，随着各国收入水平陆续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行列，全球化、区域化和民主化对这种赶超战略的负面冲击会越来越大，并最终要求其不得不走上转型之路。

第3章，东亚经济治理模式转型。从本章开始，我们将依次讨论东亚经济治理模式、政治与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转型。所谓经济治理，指的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经济行为的诸多方法的总和，通过它，相互依存的经济行为人（生产方、供给方、分销商、工人以及国家机构）自愿地协调或层级制地控制其自身行为和相互行为，从而使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最终能够得以调和。本章的分析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各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调整，第一次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以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自觉地累积着经济泡沫，直到危机爆发；此后，东亚各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不得不再次做出重大调整，其变化的方向则是加强监管。不过，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东亚经济治理模式重回政府威权管制时代，

而是在市场与政府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更加合理的边界。

第4章，东亚政治和社会制度转型。早期处于赶超阶段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具有威权的体制特征，这种发展模式集中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为其威权统治获得合法性和民众的支持。但是，威权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具有转轨的性质。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过渡到中等收入的国家，中产阶级队伍将迅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社会结构、信念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与累积，会逐渐演化为对现行威权政府的不满，并最终推动极权政府走向民主化的改革之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本章系统探讨了这种变化的主要内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以多元化和民主化为其主要特征的政党重建。此后，分析了金融危机与东亚国家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在部分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金融危机总体上还是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危机后各国的民主化普遍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5章，东亚区域合作与国际分工模式转型。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视角，本章主要讨论东亚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转型。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东亚的区域合作经历了从自发的市场化推动到自为的政府主导的过程。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政府并不热衷于推进地区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以各个国家相似但独立的发展战略为基础，依靠市场推动而逐渐融合起来的。在此格局下东亚经济呈现出一种雁阵的发展态势，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和贸易带动的，以内部网络生产结构为循环机制，以雁行提升为发展机制，以发展水平和结构调整能力两头依赖为约束机制的紧密的经济联系。然而，随着后发国家经济的不断赶超并趋同于先行国，这种区域分工模式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这种垂直的区域分工结构逐渐向水平分工的结构演进，雁行发展模式逐渐被一种称为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结构所取代。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

第6章，后危机时代的东亚经济。本章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视角，讨论东亚区域网络分工与合作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的走向。基本观点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东亚来说是“危”、“机”并存。一方面，危机使东亚经济陷入衰退，并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危机又迫使东亚各国真正明白，以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型，实现内外更加均衡的经济增长。如果说1997年金融危机是东亚在其全球化道路上由于自身脆弱性而遭受的制度性冲击，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冲击，则是基于全球供应链断裂而产生的结构性冲击。危机过后，东亚必须重新审视这种由于国际分工脆弱性而产生的风险，推动地区经济朝着一种内需与外需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更加均衡的方向转型。

本书是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世界变革中的转型经济”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程伟教授组织了各个标志性成果的选题和大纲确定工作。本书大纲由我完成并经讨论最终确定。之后，我邀请崔岩教授和佟苍松副教授作为主要撰著者与我一同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刘永刚博士、于彬博士和杨攻研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具体分工是：第1章由崔岩教授撰写；第2章由刘洪钟教授和杨攻研博士研究生完成；第3章由刘洪钟撰写；第4章由刘洪钟教授、于彬博士和刘永刚博士合作完成；第5章和第6章由佟苍松副教授和刘洪钟教授合作撰写。全书初稿形成后，刘洪钟对一些章节提出改写意见，交由撰著承担者进行二次创作。之后，刘洪钟对全书进行修改和统纂，最终定稿。

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吕萍女士，她欣然接受本书，并为书稿能以较快的速度最终面世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张庆杰博士和向焕强先生，他们精湛细致、卓有效率的工作为本书去掉了不少瑕疵。

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洪钟

2012年7月

目 录

1

理解东亚模式	1
1.1 日本奇迹与东亚模式的缘起	1
1.1.1 日本经济赶超的历史进程及特征	2
1.1.2 日本的制度演进	7
1.1.3 日本模式的构成与特征	12
1.2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形成	15
1.2.1 雁阵型经济赶超	15
1.2.2 东亚模式的形成	21
1.3 东亚模式的结构分析	31
1.3.1 威权政体	31
1.3.2 发展主义、发展型体制与工业化战略及政策	42
1.3.3 利用外资、出口导向的开放体制与东亚紧密型 区域经济联系的形成	56

2

东亚转型的提出	65
2.1 世界变革与东亚面临的挑战	65
2.1.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变革的主要趋势	66
2.1.2 世界变革对东亚的冲击与挑战	73
2.2 赶超战略的悖论	83
2.2.1 市场的矛盾	83
2.2.2 经济赶超战略与东亚奇迹	87

2.2.3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亚赶超战略的局限性	91
2.3 东亚转型的方向与维度	96

3

东亚经济治理模式转型

3.1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99
3.1.1 新自由主义革命	99
3.1.2 华盛顿共识	104
3.1.3 新自由主义与东亚	108
3.2 东亚金融危机	114
3.2.1 危机的起源和特点	115
3.2.2 货币危机抑或制度危机	117
3.3 危机治理与制度重建	121
3.3.1 IMF 与危机治理	121
3.3.2 经济治理制度的重建	125

4

东亚政治和社会制度转型

4.1 经济危机与东亚威权体制退出	140
4.1.1 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互动演进	141
4.1.2 经济危机与东亚民主化运动	146
4.1.3 政治竞争体系建立与威权体制退出	150
4.2 东亚新兴民主制度的国家治理	152
4.2.1 市民社会的形成	152
4.2.2 政党重建及其政策影响	155
4.2.3 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与民主体制的巩固	158

5

东亚区域合作与国际分工模式转型

5.1 雁阵发展与东亚区域化合作	165
5.1.1 市场推动下的雁阵模式	165
5.1.2 雁阵发展模式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支持性和批评性研究	170

5.1.3 雁阵发展模式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性质	173
5.2 东亚金融危机与区域主义转型	173
5.2.1 危机与合作转型：从区域化到区域主义	174
5.2.2 东亚区域主义合作的主要内容	175
5.3 中国崛起与东亚分工调整	185
5.3.1 中国参与东亚分工的历程	185
5.3.2 21 世纪中国崛起的东亚意义	191
5.3.3 东亚分工格局的改变	194

6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经济	200
6.1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200
6.1.1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根源	201
6.1.2 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206
6.2 后危机时代东亚转型的深化	210
6.2.1 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分工重构	211
6.2.2 东亚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深化	219
6.2.3 东亚重构中的中国角色	227
参考文献	229



理解东亚模式

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亚区域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及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世人在关注东亚地区迅猛的经济发展态势及其对国际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还更为关心东亚地区实现成功经济发展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亚区域各国家和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前的落后的殖民地经济一跃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等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东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重要转型期？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尽管关于东亚的发展体制及其机制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但在分析东亚转型问题时，首先对东亚经济发展以及体制构成模式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评析，还是非常必要的。

1.1 日本奇迹与东亚模式的缘起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发展阶段与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在发展阶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问题时如何对日本加以定位，即是否将其纳入到东亚范围之内，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这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东亚地区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但是由于日本不仅仅是在地理上位于东亚地区，而且它作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后起之国，其经济赶超模式对东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后来东亚模式的“原型”，加之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日本在经济方面出现了“回归东亚”的倾向,日本经济同东亚各个国家及地区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型经济联系,因此,在研究东亚模式的起源、演变等问题时,是不可能绕开日本的,从日本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密切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讲,将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成员,纳入到东亚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东亚模式是由早期日本模式发展演变而成的,因此,理解东亚模式有必要从剖析日本模式开始。

1.1.1 日本经济赶超的历史进程及特征

日本作为东方的落后国家成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遭到战争重创的条件下,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再度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落后的条件下起步并通过快速发展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追赶,这一发展模式被称为赶超式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经济被称为“赶超经济”,同时也被看做成功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典范。

中国对日本实现赶超式发展的研究,集中于对现代日本经济方面,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迅速的工业化发展上面。将这一时期的发展界定为日本经济赶超,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赶超观。研究日本的赶超式发展,必须将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整个近现代化发展过程纳入到研究范围,由此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日本的赶超式发展。

1.1.1.1 日本赶超经济国家的定位

关于日本是不是作为后起国家成功实现赶超式发展,或者其实现成功的原因为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对日本发展初期的国家给予准确的定位。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在其著作《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①中,介绍了日本人类学者梅棹忠夫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在 19 世纪日本同西方国家相比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才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对此,提出“比较文明论”的梅棹忠夫给出了不同

^① [日] 大野健一著,臧馨、臧新远译:《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中信出版社 2006 年版。

的意见。他认为,把江户时代的日本看做落后国家的这种普遍观点是错误的。日本不是落后国家,而是和西欧一样,是世界上两个非常独特的地区。日本与西欧都和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中国、印度、伊斯兰)保持着不远不近、非常微妙的距离。与位于大陆的社会相比,两者根据自身需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免受了侵略和破坏之苦。这就能够使历史得以积累并有机地向前发展。与每次遭受侵略后就不得不再从零开始的社会相比,日本和西欧各国把国内的文化与外国的影响非常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才创造了以此为基础进行内部发展的空间。在这样极为相似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和西欧独立且平行地实现了各自的发展。……因此,和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一样,日本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实现了高度的近代化并非偶然。

梅棹忠夫从比较文明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近代化初期实现成功发展所具备的社会基础,并将前现代阶段的日本定位为世界先进国家。甚至认为日本的发展落后于英国的原因在于莫名其妙的锁国政策,否则日英两国甚至可能同时经历工业革命。尽管这一观点是非常独特的,甚至被大野健一称为是震撼性的,但是由于梅棹观点具有过强的假设性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日本发展初期的现实,因而是值得商榷的。由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其发展轨迹的推断是不能建立在任何的假设基础之上。以任何假设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断,都是不能得到验证的。

我们认为,社会发展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承认日本在江户时代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这一基础对于日本能够顺利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并实现快速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的。南亮進曾经系统地分析了日本从前现代社会继承的社会遗产,为现代经济增长所做的条件准备。尽管这些前期准备条件表现在社会经济政治和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但尤为重要的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间接资本方面具有的高水平。^①

在人力资源方面,南亮進指出,明治日本从江户时代继承的遗产之一,是丰富的优秀劳动力。1872年3400万人口中,有2100万个劳动力,重要的是,这些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易于适应新社会和新经济组织的要求,在新兴的现代产业中这些劳动力付出的劳动,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国民素质的提高源于教育的普及。江户时代日本教育主要依靠私塾来

① [日] 南亮進:《日本の経済発展》,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年版。